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英 憲 精 義

(三卷)

戴 雪 著 雷 賓 南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英 憲 精 義

(三卷)

戴雪著 雷賓南譯

漢 譯 世 界 名 著

英憲精義

第四章 法律主治的體用

第一節 引論

自諾爾曼征服（解1）以來，英格蘭的政治制度呈露兩件異彩；他們的存在與運行足以使英國所有制度別異於他國所有。

兩件異彩中之第一件是：中央政府在通國之中居於至尊地位。當民族歷史初期，這種國家的威權集中於君主一人的身上；因此之故，元首所有權力實足以代表國家所有。英王在此時不但是保安的靠山；而且是法律的淵源。所以當時法院有一格言（解2）：「一切權能都寄附於他的身上，而且從他一人自身發軔。」（註1）這句格言，從造端時說起，原

來根據一件現成的及無疑的事實而發出。如今時移勢易，王室固有的至尊權力已經禪讓於巴力門，而變成巴力門的主權。巴力門的主權是本書所有主題之一；（註²）惟上文早已闡發題義而無餘蘊，是以此章無庸深論。

法律主治

兩件異彩中之第二件與第一件甚相關切；他是法律的至尊性，或稱法律主治。這是我們的政治所有怪異性質；法院有一條老規矩（old law）最能將此項性質表白清楚：即是，這種法律是最貴國寶，爲君主所有；全國人民以至君主本身都須要受治於法。倘使法律不能爲政，以至全國無法律；必至全國無君主，復無任何遺產之可言。（註³）

這個法律的至尊性，倘自別的視點觀察，是個人權利的一種保證，爲英憲所授與。他是英憲所有第二異彩，因之，他的奧義即爲本書部乙所欲探討。

外人之覘國者，對於此項英吉利政情，深滋怪異，復不覺感慨繫之。於是政論名家，如福惕爾（Voltaire），狄龍（De Lolme），篤奎爾，或格乃士（Gneist）一流，（解³）雖則均屬外產，然而他們所有觀感英吉利政治制度的印象，實較任何英國本國人爲深刻。依他

們的觀察，英格蘭是一個國家，有獨與其他國家立異的一點：就是法律主治。法律精神與英國人的習慣，兩相結合，牢不可破。因此之故，他們關於此一異點最多感觸。就所有上列諸人之中，莫如篤奎爾最能道達這種驚訝或嘆美的情緒。篤奎爾嘗就守法精神一要旨，取一八三六年之瑞士，與一八三六年之英格蘭，相互對勘，而得到下文的結論。

篤奎爾曰：『我在此頗不欲以合衆國比瑞士；（註4）惟欲以英格蘭與之相比。倘若你要考察瑞士與英格蘭時，或則縱使偶爾行過兩國時，你終要自然而然而也感覺到兩國間所有相互異點。兩相比較之餘，我們儘可概括地下一斷語：即是英格蘭到底是比较這個希勒弗惕民國（解4）（The Helvetic Republic）更富有平民政治的精神。這一點差異，隨處可在兩國制度中尋見，尤可在他們的風習（moeurs）中尋見。

- （1）在幾乎全數的瑞士州郡中，報紙的言論自由，只是一件最近纔有的事。
- （2）又在幾乎全數的州郡中，個人的自由並不被充分保證，因之一個人可受行政處分，而至於被逮及被押獄中，無須經過許多法律手續。

(3) 大概言之，瑞士法院不有完全獨立的地位。

(4) 在全數州郡中，以陪審制度折獄，至今未有。

(5) 在幾處州郡中，他們的居民在三十八年前絲毫不有政治權利。徵實言之：鵝

皋 (Aargau)，蘇皋 (Thurgau)，惕星 (Tessin)，弗奧特 (Vaud) 的全部，及聚力 (Zurich)

比恩 (Berne) 的一部，皆屬此類。

上方所得結論，用以批評瑞士風習，較之批評制度更見真實。

(1) 在許多瑞士州郡中，大多數國民對於自治十分無興味，因之，並未有這種習慣。倘若國家有變亂發生，他們儘管盡心經營私事，絕少留心公務。至於英吉利人民則異是；他們盡瘁國事，絕不以私害公。

(2) 瑞士報紙，以新得自由之故，往往好濫用此項權利。故以瑞士新聞報與英吉利新聞報比較，前者常傾向革命論調；後者尙屬實際而切當時勢。

(3) 瑞士人似乎仍視集會結社爲一種革命的工具；此類傾向正與法國人無異。

他們還不能及英國人民專以集會結社爲一種極緩却又極穩妥的政治改革的方法。原來集會結社不但是一種技能，而且是一種國民應有權利，瑞士人民似尚未認清此旨。

(4) 就愛直道一端論，瑞士人民遠不及英吉利人民。瑞士的法院在政治措施中不能置喙，而且不能以法律意見引導輿論。以法律意見領導政治行動與直愛道兩事，原來是自由人民的最顯特性。

(5) 最後，瑞士人民究竟尙缺乏幾種政治習慣：卽是，尊重直道，愛好法律，與不贖武力。數事皆自由人民所以能存在的要素，最顯著於英國。

繼此我當以數語綜括前論。

無論何人，倘若曾在合衆國遊觀，必不能自禁其爲一件事實所感動：卽是，以自由的精神能固結亞美利堅人民的習慣若是，復以他們又能篤嗜自由若是，合衆國的國體只好是民主國家。同樣以英吉利人民所有政治習尙論之，倘謂英國的政體，除却自由政府外，竟可成爲專制政體或其他政體者，實不符於事理。至於瑞士則異是。假使現有民主制

度竟被暴力摧殘，瑞士人民，或不免於短期間變故之後，習視自由的失去爲常事。故以三國所有政情互勘，英美兩國所有自由在人民的風習中實較在法律中爲盛；瑞士所有，適與英美兩國相反。（註5）

篤奎爾的
論與法的
意志之關
係

綜觀篤奎爾所批評，就中有兩要旨，恰與法律主治的題義十分關切：第一，他的議論足以提示法治是英吉利制度所有顯著特性。第二，這種議論足以指點英吉利民族的一個品性實在可以注意，然而極難以言語形容。篤奎爾在觀察中蓋遇有一難題焉，他明明認識一件異彩的存在；但仍不能區別這件異彩於他種政治心理以外。所以他不免有時竟使這異彩與自治的習慣，秩序的愛好，直道的尊敬，及法律的傾向等事互相混淆。本來諸如此類之政治心理原互相聯屬，然而他們決不是同一事實。倘若竟將彼此互相印證，混爲一談，則又不免陷於不正確之病。雖然，篤奎爾評衡政治，素稱精細，但仍不免有此失，至爲可惜。况旁觀者清，當局者迷，我們自己於此必知所自做。是以通常我們論及英國，我們輒謂英吉利人民尚法治，或謂英吉利憲法具有法律的至尊性。此類用語，在發言者自

觀，雖則含蓄實際的義理，然而在他人間之，只覺廣泛無稽。然則將欲領會法律主治或法律的至尊性，或法律的優勢 (rule, supremacy or predominance of law) 等術語所包含與義，我們必不可不先確定此類術語所有真諦，至為明白易見。

第二節 法律主治的二個指意

每逢本書論及法律的至尊性，或法律主治，是英吉利憲法的一個主要特性，我們通常概括三個分明而又聯立的概念。茲當分別提示之。

第一目 武斷權力的不存在

第一，概念指明凡人民不能無故受罰，或被法律處分，以致身體或貨財受累。有一於此，除非普通法院會依普通法律手續，訊明此人實已破壞法律不可用在如此指意時，法律主治與下方所陳一個政制剛相反。這個相反的政制是在政府中有一人或數人能運用極武斷，又極強奪的制限權力。

今代英格
蘭與今代
大陸國家
互勸十八世紀
英格蘭與

今代英吉利人驟聞此語，會須驚訝，以為「法律主治」（依本文所用指意）何事？那能令英吉利制度專美？倘自今日政情觀之，凡在文明而又有秩序的國家內，這種政治變成普通慣習，似乎非英國所專有。雖然今代歐洲大陸已盡被文明國家所佔居，此類政象復不能謂為完全缺乏於大陸；但即就現況觀察，我們仍敢相信，用在這種狹義的「法律主治」一事，實是英格蘭所有別相。否則再推廣言之，我們只可說這種別相惟附屬於一切國家之會傳受英吉利傳統思想者如合衆國之類。此外國家之散佈於歐羅巴大陸者，行政院概具有大權，遠過英國行政院所有。譬如，關及逮捕，羈押，以至驅逐出境等處分，大陸各國行政院實能運用極大的裁奪威權；英國行政院必不能企及。試一考察歐羅巴政治，英國讀者必不禁得到一種感想：即是，大凡行政院能以裁決權能（discretion）

（解5）執法，就中即不免有許多武斷性（arbitrariness），（解6）而在一民主國中，一如在君主國中，行政院若有法律上之裁決威權，人民必至受不健全的法律自由之累。

然而此固未可以概論。倘使我們專就二十世紀的歐洲觀察，我們似須讓步。這是要

說，在幾乎全數的大陸國家內，法治漸能確立，仿佛英國。在此際假使個人不要牽入政治，或只要能遵守法律，此人可以無須畏懼政府，個人的自由不至受害。誠如是，我們推理所及，必至遇一件難事：即是，法律主治既成普遍現象若此；然則一般外國政論家必欲以武斷權力的不存在為英憲的主要特性者何故？（註6）

雖然，此非真難事也。假使我們能回顧百年以前情事，至於英憲最初被批評又被頌揚之際，這種迷督必可以渙然冰釋。當在十八世紀中，許多大陸政府本不是暴虐；然而在任一國中，無一個人能安居於武斷權力以外。惟有英國在此際能卓然有所樹立。試一考究他的特長所在，讀者自見此項特長不是在於善政，復不是在於寬政，却是在於政制中之法律性。故當福惕爾離去法蘭西而遊英格蘭時，他所有最強大的情感是他適纔舍棄一個專制國家，復正在行入一所地方；這所地方所有法律儘管是嚴刻，然而當地人民只受治於法律，而不受治於人情好惡（caprice）（註7）。福惕爾者法國文學家也，不但他的文學恰足以代表他的時代，而且他的感情亦足以代表他的時代。於是他儘有充分理由以

抉出雙方所有差異。試再就個人的身世所遭逢考之：在一七一七年福惕爾曾因一首詩之故，被發放於巴斯體耶獄中，不但福惕爾未曾寫這首詩，而且他不知作者誰氏，復不表同情於詩中所表情感。顧一被誣陷，福惕爾縱有口舌亦不能自辨。尤可異者，當時攝政處分此案實等於戲弄他人毫不經意。攝政謂此首諷刺詩既以『我未曾見』爲題，他的作者即應受命入獄，庶幾這個詩人『得見前此所未見』。於是福惕爾遂不能不入獄矣。又在一七二五年，福惕爾赴一位公爵之宴，飲食之際，福氏忽被強奴迫令離席，復被鞭撻於這位公爵之前。當是時，福惕爾的文名鵲起，在國內已有文豪之稱；顧不能取得一機會，以求申雪。後來因爲他自不量力，尙以此次受辱爲言，卒須重遊巴斯體耶一次。誠然，這次是他入獄的最後一次，但終此一生，他常時與武斷權力相衝突，復相抗衡。因此，他的生命屢瀕於險。註8幸而他的文名，他的聾耳，他的機變，與最後他的財富，尙能拯救這位詩人，使受罰不過於暫時入獄。然則法國在當日所有政治，蓋一味專尙武斷若此；至於英國所有則何如？任何人倘欲灼見法律的至尊性在十八世紀中之英格蘭是怎樣稀罕的一個政

治現象，讓他自己讀摩梨所著狄爹裸特傳（解7）。按本傳，法國在那時只有一部百科全書（解8）尚須費二十二年之磨折，方得完全出版問世，一般著名文學家由之方能得一機會以發洩積愆。卽此一端，無論就抗爭的困難着想，或就抗爭的成功着想，俱可概見法蘭西政府所有武斷權力之大。

雷十五世（Louis the Fifteenth）在法蘭西皇室中原屬暴主，所以百科全書阨於御用特權，難於出版，當不足怪。不過此類跨越法律的皇家舉動初不限於雷十五世；因爲他只是法蘭西行政系統的產兒。試觀在雷十五世之後登位者實爲雷十六世，其爲人本非暴戾，然而武斷權力仍時時運用如故。由此可見武斷權力與法國政制原來兩相繫屬，不可分離。惟其如是，倘若有人假設一類事實，謂法律主治早存在於一七八九年前之法蘭西君主國家，如此設想只是謬誤。讀史者不嘗見爹雍武士（Chevalier d'Éon）之待遇（解9）乎？這人所受待遇的愚駭，屈辱及神祕發生於百年以往，恰如冒名欺騙以要索權利之舉動發生於今日，足以聳動他人視聽而作談資。此類事實，自今日觀之，至不足道，

復不值追憶。但我們於此有必不能忘記者一節：即是在一七七八年，即當約翰生 (John-son) 亞當斯密 (Adam Smith) 稷本 (Gibbon) 考別 (Cowper) 布雅克 (Burke) 及曼田 (Mansfield) 等生存之日，即當亞美利堅獨立戰爭尚在進行之時，又即當全國會議 (The States General) 開會前十一年之期間，竟有一名武士及一個有名外交家，不知所犯何罪，不經審訊，復不經定讞，竟遭疑忌，復受奇辱；而此類罰則與奇辱，雖在東方專制主義國家亦不敢創制及施行。(註9)

雖然，讀者慎毋因此一節，遂遽然想像在十八世紀中法國政府當比其他大陸國家之政府，較爲武斷。設此假想只是誤會大陸的政情。按實言之，法律與公意，在法國中，以視在西班牙中，在意大利小邦中，或在日耳曼市府國家中，尙能比較地見重。至於專制政體之弊害所有已經存在於法國者不特並行於上列各邦；而且爲害更烈。正以太過刻毒之故，上列各邦之苛政，筆不勝書，口不能盡道；於是世人視聽乃撇却上列各邦而移向法國。是故法蘭西君主的權力，比諸散處歐洲二十許小霸王之藐法行動，反受極嚴厲譏彈者，

並非因爲前者較後者爲更暴虐；實因自世界眼光觀察，一則以法蘭西民族在十八世紀之進步論，亟應取得大量自由；二則以傳統思想論，法蘭西自古素爲專制政治之中心。惟是，巴斯體耶的陷落遂博得全歐之同情。實則當那一堡壘被攻破時，在內囚犯不及十人；而在英國牢獄，負責囚徒之奄奄待斃者不下百數。顧英人在當日爲感情所蔽，遂不能分別審察。乍見之際，他們慶賀法國革命成功的狂熱，實爲生在二十世紀的英人所不能了解。但試詳細玩味，則這種同情瀾漫於文明世界間，橫極東西，縱盡南北，自有緣故。巴斯體耶非他物；他只是毫無法紀的權力之一種象徵。所以他的陷落當足以惹起歐洲人士的感觸，（而且此項感觸至屬確當），以爲這種捷報，實所以報知其他大陸國家，謂向來存在於英國中之法律主治，行將代武斷權力而興起。（註10）

第二目 普通法律與普通法院居優勢

第二概念指明，（註11）在英格蘭四境內，不但無一人在法律之上；而且每一人，不論爲貴爲賤，爲富爲貧，須受命於國內所有普通法律，並須安居於普通法院的管轄權之治

下。

法律平等的意思，（這種意思，換一句話說，包含凡人皆受治於普通法律，而普通法律復執行於普通法院）被推行於英國中，蓋已達於極大限度。所有在職官吏，自內閣總理以至巡士或徵稅差役，倘若違法，一律與庶民同罪。故當他們以個人資格行事而犯罪時，法院固然無所寬假；縱使他們不以私人資格犯罪，惟因執行公務而至於越權，法院仍責令賠償損失。諸如此類之案件司法公報至多刊載。故有一殖民地總督（註¹²）一內閣部長，¹³陸軍將士（註¹⁴）以至一切屬吏，雖則執行上司命令，然而必不能越權行事。倘若所行之事有爲法律所不許，這個官吏，須自己負責任，一如私人或非官吏須對於自己行爲負責任。誠然，兵士（註¹⁵）或國立寺院僧侶的法律地位，在英國一如在他國，與尋常百姓的法律地位頗異；卽是，前兩者除受治於普通法律外，復各被管轄於一種特殊法律；這種特殊法律實未嘗治理普通人民。因此之故，他們在某種特例中須求平反於不同普通法院的一種裁判所。這是要說，官吏有時在一定範圍中受治於所謂「官法」（official law）。雖然，

這件事實並不矛盾上列原則。（即是，凡人在英國內皆受命於本國普通法律。）誠以一個兵士，或一個僧侶，縱使因地位關係至於負荷尋常百姓所不負荷之法律責任，但並不以此之故便能拋棄普通國民的本分。

就一個英吉利人的眼光觀察，他自然不免有一想像，以為法律主治，（依本文所用指意）只是任一文明社會通有的習尚。然而這種假設實屬謬誤。大概言之，歐洲在十八世紀以前，貴族，僧侶，以至他種人物均能藐視法律；至十八世紀之末，歐陸民族之大多數漸能脫離這一時期而演進。若以英格蘭而論，貴族僧侶的無法時期，早於十六世紀之末，經人民以流血解脫。但嚴格言之，雖在今時大陸國家中，若云，人人受治於同一法律，或云，法院在通國中為至尊，此節未見得可以完全證實。試以法蘭西為實例。在法蘭西中官吏——在此名詞之下，所有服務於國家內之各種機關的人物應盡數包含——當在職時，於一定範圍內，不但被撇開於普通法律以外，超越於普通法院的管轄權之上；而且有幾時受治於官家所執行之官法。如此論斷，驟聞之，未免驚人；細察之，卻是絲毫不謬。